

中共政治、經濟發展

與改革動向

陳 德 昇

回顧並檢討中共政治、經濟體制的淵源、運作與改革之互動關係，不僅顯示出「經濟決定論」與蘇聯斯大林政經發展模式的局限性，更凸顯政治與經濟體系互動均衡功能的維繫，是一整體社會健全發展的實質要件。此外，本文亦透過中共派系政治、本質與策略，以及比較共產政權政經改革的觀點，評估中共政經改革動向與趨勢。

政治、經濟體系應具互動均衡功能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強調集體社會物質條件的實存與變遷的理論。其理論是以生產方式 (the mode of production) 的靜態結構關係與動態變遷過程，描述人與社會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互動關係。生產方式包含兩組概念：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前者指涉分工、生產技術、生產因素間的組合及水準等技術經濟性基礎關係；後者包括生產工具的擁有與生產剩餘的分配關係。而此經濟結構是一個社會的基礎結構 (infrastructure)；政治、社會、文化等關係都是此基礎結構所衍生的上層建築 (super-structure)。【註1】儘管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日後在事實、理論的檢證與因應革命情勢的需要而凸顯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註2】，但基本而言，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論是以經濟因素為主導的歷史觀。然而，無論從歷史發展的脈絡，或是不同政體下政經互動關係的演化，皆明確顯示：在特定的時期與特定的條件下，政治與經濟存在相互決定（互為因果）、影響與制約之關係，且蘊含「自主」(autonomy)與「互惠」(reciprocity)之功能。【註3】

在馬克思主義架構中，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階級」是擁有和控制生產資料的階級。它由於被賦予的經濟權力之關係，因而能利用國家，把國家當作統治社會的工具。【註4】馬克思亦認為：國家是一個階級壓迫其他階級的組織性之權力，故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將會消亡。而「政治」則是依緣於「經濟」，是「第二性的」及「派生的」，因而政治是「無能的」。他把經濟視為基礎結構，政治只是上層建築。依此觀點，馬克思把民主看作僅是「形式的自由」(formal freedom)。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乃「形式的民主」，而必須輔之以「經濟的民主」。馬克思強調經濟權力的重要性，顯然把經濟的重要性過份誇大。他改變社會的理論在根本上著眼於經濟關係，其論點可說是一經濟的典範 (economic paradigm)。然而事實上「政治」不必是第二性的，它不是經濟的附屬現象，它是有自主性的。【註5】資本主義的社會能自十九世紀以來不斷修正改變，不能說

不是受到政治的積極干預所致。政治在國家的發展中亦扮演了推動經濟的角色。而在共產主義社會，政治尤處於決定性的地位。【註6】在共產經濟體系之下，國家不但未曾「消亡」，而且越發膨脹，「官僚機器」（黨政機構）成爲碩大無比、無遠弗屆的「巨怪」，整個社會亦演變爲一「政治統宰」的體系【註7】，個人之自由與權利皆因沒有民主法制而失去保障。卡爾·巴伯即曾指出：馬克思之「政治無能論」，特別是馬克思對「民主」的觀點不止是錯誤，而且是「致命的錯誤」。【註8】

馬列主義政治體系的建構是以政治上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經濟上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與按勞分配爲主要內涵，期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流弊，並使無產階級獲致真正的解放。依照馬克思的論點，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階段，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過渡時期。它一方面承繼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從事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成果」。另一方面，則透過以下三個階段，保證人類社會邁向共產主義社會：(一)無產階級首先成爲統治階級；(二)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力，一步一步地將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生產資料集中於無產階級手中，並儘量迅速的增殖生產力總量。在這階段中，不可避免地將採取暴力的手段；(三)消滅資本主義舊的生產關係——亦即把所有的階級對立一併消滅——代之而起的將是「以各個人自由發展爲大眾自由發展條件的協會」。然而，世界各共產國家無產階級專

政的實踐卻無不異化爲共產黨一黨專政。曼德爾(Ernest Mandel, 1923-)即曾強調：斯大林主義是在一個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中，確保蘇聯官僚集團對權力的壟斷，以及形成維護其特權的一切政治制度、統治機構、管理和計劃方法的總和。【註9】此外，由於政治權力的膨脹與對經濟領域的控制，形成泛政治主義的社會，因而窒息了社會的生機、扼殺人民的創發力【註10】，並長期成爲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政治專政與計劃經濟 爲政經發展不彰根源

在政治專政的前提下，計劃經濟結合公有制的探行不僅導致經濟決策與運作的政治化，且是經濟發展成效不彰的根源。密塞斯(Ludwig von Mises)即曾指出：計劃總是意謂政府權威當局的計劃，以及政府以警察力量爲後盾來執行其計劃的命令。計劃與自由企業及生產工具的私有是相反命題(antithesis)，計劃與資本主義完全不能相容。計劃生產的體系是根據政府的命令，而非根據企業家以提供顧客需要的服務來追求利潤的計劃。【註11】美國經濟學家貝倫(Paul Baran)亦根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的結果指陳：在落後和低度發展的國家實施社會主義，必然導致一種「落後和低度發展的社會主義」(A Backward and Underdeveloped Socialism)。其特徵是：生產力低落、資本累積不足、科技力量

薄弱，以及經濟發展停滯性遲緩。另一方面，因受到意識形態的鞭策和中央計劃經濟的操縱，在社會財富不足的情況下，只能對有限財富的政治性分配，形成「匱乏性均等」，從而犧牲了經濟效率與消費品質。【註12】此外，以實現生產工具國有和全面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實是一種集體主義，它與民主政治所根據的個體主義是互不相容的。因爲在集體制度之下，個人自由與尊嚴都失去了保障，政治反對勢力亦無經濟的憑藉。【註13】明顯地，專政體制是實施計劃經濟與公有制的政治基礎，而計劃經濟與公有制則是厲行專政統治的經濟條件。【註14】

中共政經體制之形成與建構主要是承襲自馬列主義與蘇聯斯大林模式。因此，政治專政、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與重工輕農發展策略的探行，便成爲中共政經體制的特質。就其政經體制互動運作特性而論，中共是透過專政的機能與政治運動的開展以建構其經濟體制。換言之，政治因素在經濟體制形成與鞏固的過程中扮演著「支配性」與「決定性」的角色。而計劃經濟與公有經濟體制的特質，否定市場經濟機能，因而必須仰賴共黨官僚與行政體系運作，於是進一步強化了專政程度與控制能力。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經濟發展初期的政治熱情與理想固有助於經濟成長目標的實現，但就長期而言，經濟決策政治化、經濟管理官僚化與經濟運作行政化皆導致經濟效益不彰，並妨礙經濟發展目標之達成。此外，就中共

政經體制實際運作功能與效果而論，其經濟成長呈現循環波動的現象，且與政治派系、路線與權力鬥爭存在顯著的相關性。而透過政治鬥爭運作階段性的終結，往往對經濟發展路線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明顯地，一九七〇年代末期，政局變動，領導階層更張，以及經濟持續性衰退是促成現階段中共經濟改革的政經背景。

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相繼推動農村、對外開放與城市經濟改革。由於改革政策與措施消滅政治因素對經濟運作的節約，並下放生產與經營的自主權，因而使得生產力提高、經濟持續成長、人民生活與收入亦獲致初步的改善。然而，囿於意識形態、政治阻力與改革政策取向之局限，因而無法發揮持續性的改革效果。換言之，中共現階段採行之「中國式社會主義」，其內涵仍堅持所有制結構以公有制為主體，開放有限度的私營經濟，並強調實行計劃與市場混合的經濟制度【註15】，是導致經改十年成果無法持續與鞏固的經濟因素。【註16】大陸國營企業採行各項改革後經營績效仍然不彰。【註17】競爭型的市場機制不健全，官僚體系與行政手段的干預使難以避免，因而抑制企業活力與潛力的發揮。【註18】誠如傅利曼所指出：只要政府所有制的工業仍舊由官僚經營，他們對市場壓力作出有效反應的能力就會受到嚴厲的限制。【註19】因此，化解深化經濟改革困境之道在於：突破意識形態的藩籬，並加速經濟自由化的進程。而這些目標的實現必須以政治變革為前提。

中共經濟改革不僅具有政治意涵與效能，且對政治安定、「認同」與「合法性」程度產生影響。基本而言，經濟改革若能發揮持續促進經濟發展的功能，便有助於強化人民對政府的「認同」與政府本身的「合法性」基礎。反之，由於經改成效不彰，且改革之副作用降低人民生活素質，勢必影響人民支持改革的意願，並腐蝕經濟改革的政治基礎。明顯地，中共改革初期實行農村改革，擺脫了「人民公社」體制的束縛，使得農業發展迅速；對外開放政策引進外資、技術，以及促進國際經濟交流，皆對中共政治產生正面的功能，並奠立政治「合法性」基礎。然而，自一九八五年推動城市經濟改革後，由於改革措施影響共幹的既得利益因而面臨強勁的政治阻力，使得改革政策長期無法落實。此外，價格改革、市場機能不健全，以及共幹特權介入「倒買倒賣」因而引發物價大幅上揚，導致人民生活水準降低、民怨四起。而失業加劇、所得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傾向，以及期望升高與實際滿足間差距擴大，亦衍生社會不安。於是在此一經濟背景下改革的動力日趨消蝕，人民對中共的政治認同與中共的政治安定則面臨嚴峻的考驗。

保守勢力與派系鬥爭

影響經濟改革與發展

中共在改革過程中意識形態變遷、改革速度與幅度的認知差距、改革績效彰顯與否，以及「短缺經濟」體制下周期性的經濟「過熱」

【註20】，皆對中共政治運作產生互動影響。尤其是中共政治具派系政治與鬥爭的特質，政治的衝突並非透過民主程序的運作，而是透過路線與派系鬥爭贏取權力鬥爭。而握有政治領導權的派系便主宰著改革與開放政策的運作。根據以上的論述可知：中共經濟改革十年中，由於「改革派」透過意識形態的調適、改革政策的推展與績效的彰顯，基本取得改革與開放政策的主導權。然而，意識形態的鬆弛、階段性的改革挫折與危機則成爲「保守派」爭奪政治領導權的憑藉，而「保守派」往往是透過政治運動的訴求，並進而影響改革政策的執行。一九八三年「反精神污染」與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開展足爲表徵。而一九八七年初「反資」鬥爭期間，以及一九八八年九月經濟情勢日益惡化下舉行之「十三屆三中全會」後，改革路線即採「保守派」之經濟改革主張。明顯地，中共政治派系糾葛與權力傾軋使政治運作機能不彰，是導致改革政策缺乏持續性與穩定性的主因。

雖然中共經濟改革中開放私營經濟發展，但卻無法實現政治民主化的目標。其中不僅由於有限度的私營經濟發展無法形成大量的中產階級，而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治精英否定西方民主理念，以及對共黨專政本質的堅持。換言之，一個社會結構出現分化，政治參與管道逐漸開放的社會，並不必然導致政治體系的真正合理發展。因爲一國之經濟發展能否導向實現民主政治，並非取決於經濟發展的程度與社會

多元化的條件，而主要在於政治精英對民主政治的信念與實行決心。儘管如此，為適應經濟改革與客觀形勢的需求，某種程度的政治自由化將為中共所容許。此外，經濟改革遲滯不前且政策落實困難的主因是：共幹特權、思想僵化、既得利益的維護，以及政治派系鬥爭之運作所形成之阻力。因此，透過政治改革清除經濟改革的政治阻力，並建立政治運作規範，以維繫改革政策的持續性與穩定性便有其必要性與迫切性。

主要作為克服中共經改障礙，並期能發揮促進經改功能而提出之政治體制改革，其內涵基本上屬於行政層次之改革。雖然政治改革措施將產生下列功能：釐清黨、政、企職能，並重新加以定位；強化行政體系運作機能；化解經改的矛盾與阻力，以及透過法律的制定保障經濟改革政策的推展，但是問題在於：政治改革並非政治制度的變革，中共仍居於一黨專政的領導地位；社會主義民主僅是掩飾專政的代名詞，而非西方民主政治理念的宏揚。因此，共幹特權浮濫、抗拒、抵制、干擾改革，以及藐視法律尊嚴的積弊與缺失將無法消除，其所能發揮的促進經改效果便有其局限性。而不平衡與不配套的政治、經濟改革將陷於運作不彰與遲滯不前的困境。

中共現階段政治改革主要作為適應經濟改革的需要，顯然亦有其局限性與片面性。事實上，在一定條件下，一個社會的政治發展有其獨立性與自主性。同樣地，一個社會的政治改

革可以，而且應該有其非經濟，甚至非文化的政治目的。這是因為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人、利益集團、國家，以及社會整體都有其非經濟的基本政治慾望和利益，而這些政治慾望和利益是無法簡單的由經濟範疇來涵蓋。在此一意義上，政治改革不應該被視為經濟改革的附屬品。雖然前者可以，而且應該促進後者的發展，但政治改革更重要和更根本的目的應該是：建立和完善一個民主和多元的政治制度。人們對政治權利的追求是無法，也不應該被局限在經濟利益的框架之中。

在中共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探擇何種政體較有助於經濟改革與發展目標之達成，實為當前政治改革的要務。從中共發展經濟省察，極權專制且權力高度集中的政體是長期制約經濟發展的主因，且無法肆應中共現階段經濟自由化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註21〕事實上，經濟改革與發展與政治自由與民主是無法完全區隔的，經濟發展與自由化的過程中須有相應的政治民主與自由加以配合〔註22〕；而一個強調民意基礎、制衡機能與法治精神的民主政體較有利於經改政策之推展與落實。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傅利曼與布坎南的共同信念是：沒有政治上的自由與民主，就不容易產生持續的經濟自由；沒有持續的經濟自由，就不容易產生持續的經濟成長。在他們的認知中，經濟活動需要民主的土壤來培養。〔註23〕此外，就民主政治促進中共當前經改的現實意義而言，民意制衡、輿論監督、政黨政治與司法獨立機

能的發揮將對日益惡化的貪瀆腐化、官僚濫權產生抑制作用，經濟改革的政治阻力亦將消滅，並建立政經發展的制度化運作規範，勢必有助於化解中共改革十年中所面臨的政經危機。

民主政治是 生產力的泉源

中共對生產力的概念基本上僅局限於經濟領域與技術層面〔註24〕，但事實上民主政治本身亦是生產力的泉源，且扮演經濟改革與發展成敗的關鍵性角色。尤其是長期在一個專制政體下，經濟發展與運作受到政治因素強制的束縛與制約，因而唯有透過政治改革與法定程序將政治重新定位與定性，始有助於「釋放」經濟的潛能與活力。此外，在中共經濟改革過程中面臨著嚴重的貪瀆腐化與保守勢力的抵制，於是藉助法制社會秩序與民主政治運作規範的建立，勢必有利於排除經濟改革的障礙，從而促進經濟改革與發展。而從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的角度來看，經濟改革的推動與持續勢必加速社會動員程度、深化社會挫折感，並提高政治參與的程度，因此進行政治民主與制度化的建構將緩和並化解社經發展與變遷所可能衍生的社會衝擊，並有利於維繫政治的安定。而政治安定正是持續推動經濟改革的先決條件。

在社會現代化變遷的過程中，「整體互動」是一個重要的原則。社會體系內各個次體系必然相互影響、互相作用，從而構成一個互動的整體。「系統論」的觀點亦強調：在一個系

統中間，要改變就需要整體的改變，僅僅有某一支系統的變化，而其它部分不變，這個系統是不穩定的。【註25】明顯地，中共在現代化的構想與思維格局中僅以經濟與技術層面作為主要考量的內涵，而非文化、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全面變革。尤其是政經改革過程中基本上是以經濟改革為主軸，中共試圖透過經濟體制的調整與生產力的提升促進經濟發展。而政治改革則由於中共領導階層認知不足，以及重重阻力而陷於被動、消極的推展，於是遲滯經濟改革的進程，並導致社會體系的不穩與失衡。

主張「發展一體論」的比較行政學者雷格斯 (Fred W. Riggs)，依照派深思的說法，將社會體系分為社會、經濟、政治與行政四個抽象的部份，並肯定結構分化為發展的基本定義。而在未發展的社會，此四部份彼此不分開，沒有可見的獨立價值模式。因此要使經濟結構與其他部份分離，必先使它有獨立的價值和法則，不被政治或其他社會因素恣意干擾。換言之，經濟發展或經濟結構的分化，要與其他部份的分化配合方能奏效。亦即真正的經濟發展，實際與政治、社會與行政各方面的發展是分不開的。倘若政治結構落伍，而單求行政改善；或政治與行政皆腐敗，而奢求經濟發展則無異緣木求魚。【註26】明顯地，在中共政治改革長期滯後，以及行政體系運作功能不彰前提下，其經濟改革與發展便沒有達到目標的可能。

從「發展同步論」與「發展平衡論」的角

度來觀察，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就如同個人行進中之兩腳。當「右腳」（經濟）跨出一步時，「左腳」亦須隨之跟上，如此方能保持行進動作與速度的持續。否則，只強調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只跨「右腳」），而不作相應的政治變革（不跨「左腳」），顯然無法達成持續發展的目標（窒礙難行）。同樣地，就「發展平衡論」的觀點而論，政治與經濟的改革與發展速度、幅度必須保持其平衡點，始有助於整體社會的均衡發展。換言之，經濟或政治任一方面過速改革，皆將導致整體社會發展的失衡。因此，檢視中共政經改革的歷程與內涵顯然具有「發展」不同步與不平衡之特質，其對大陸整體社會發展勢將產生不利的影響。

就比較歷史與「體」（本體）、「用」（器用）觀點分析，清代「洋務運動」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維格局與中共當前現代化政策取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洋務運動」終因「中體西用」導致體系失調而面臨失敗的命運（西方科技可以輸入，西方的文化則無法接受，因為它威脅到中國的本體。然而，由於未能考慮到西方科技是仰賴於西方的思想價值而失效。西方的科技與思想價值是不可分的。【註27】而在現階段中共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亦是在堅持已實踐不通，且阻礙政經發展的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共產黨領導，以及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推動改革、開放與搞活方針【註28】，並大幅引進資本主義社會的資金、技術

與管理方法。換言之，中共當前現代化之政策取向是以「馬列主義為體，資本主義為用」。【註29】亦即西方的科學、技術與管理方法是可以接受且必須引用的，但是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與觀念則須否定與排除。此勢必造成「體」、「用」運作機能失調，並將重蹈歷史的覆轍。【註30】

政經改革具局限性 與不穩定的特質

從中共派系政治的角度觀察其經濟改革趨勢與動向顯示，「改革派」在十年經濟改革中政策賴以維繫的支持力量主要包括：經濟改革的成效、改革的受益者，以及來自於鄧小平的認同。明顯地，中共經濟改革初期，尤其是農業改革，上述三項因素的鞏固與擴張，是「改革派」持續推動經改政策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基礎。然而，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推展，在提升經濟效益的前提下，亦導致經改副作用——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失業、貧富兩極分化傾向與貪瀆腐化盛行——的顯化，並使人民隨著經改深化而降低其生活水準與素質，因而削弱了經濟改革的政治基礎。在此一背景下，「改革派」採行之經濟改革能否貫徹與持續，鄧小平的意向與「保守派」勢力的作為便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在中共鬥爭原則與規則中顯示，以權力鬥爭為核心的派系與路線鬥爭具有尖銳性與循環性的特質。因此，在「改革派」面臨經濟頹勢與鄧小平「經右政左」的思維格

局下（無法容忍經濟改革中政治民主的訴求），便成爲「保守派」奪取政治領導權與執行保守經改路線的時機。其中不僅顯示「改革派」政治基礎的脆弱性，亦反映出改革政策的不穩定性。明顯地，就派系的觀點而論，中共經濟改革仍將持續的推動，且將隨「改革」與「保守」兩派政治勢力的消長決定經濟改革路線的執行。不過「保守派」執行之改革政策將扭曲「改革派」所主張之政經改革本質與精神。換言之，中共改革政策將不致逆轉，改革政策只有本質、速度與幅度大小之分，而無是否進行改革之別。

就政治改革的發展與動向而論，中共改革十年來最大的失誤主要是政治改革的滯後與被動，因而導致政經改革失衡，這是衍生中共決策不斷失誤、貪瀆腐化嚴重，以至經濟情勢惡化的主因之一。基本而言，中共政治改革的提出主要在於經改面臨挫折後作爲因應經濟改革的手段，甚至以政治改革作爲派系鬥爭的工具（「改革派」期能藉政治改革的推展清除「保守派」與反改革勢力），而非對西方民主政治的信仰。儘管中共在改革過程中已出現政治自由化的開端，如實行縣級「人大」代表的選舉，但這些改革無是作爲政治體系本身的需求，或是適應經濟改革的運作皆是遠爲不足的。【註31】因此，就中共領導階層對政治改革的認知，或派系政治勢力更迭的角度而論，中共政治改革均將呈現保守性、被動性與行政性的特質。日後，中共政治改革的動力將不在於中共

領導階層對民主政治理念的認同，而是來自於經濟改革的頓挫，以及人民追求民主政治的強大壓力。

從比較共產主義的觀點分析，匈牙利、蘇聯與中共皆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中不約而同的開展政經改革。其中不僅顯示馬列主義與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局限性，更是其理論、理想與現代思潮及環境無法契合的具體表徵。儘管如此，由於三共產政權政經改革措施與構想的差異性，因而對其改革前景將產生實質而深遠的影響。以匈牙利而言，其受蘇聯斯大林模式影響時間最短、改革措施最爲激進與大膽。加之，民族文化傳統的特質，以及領導階層對西方民主與多黨制的認知，因而匈牙利實現西方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運作模式的可能性最高。而蘇聯儘管有戈巴契夫積極、主動採取之政治改革，且其理念與決心亦堪稱歷任蘇聯領導階層中最具雄心與魄力者，但是蘇聯封建的歷史傳統、長達數十年斯大林模式的束縛，以及強悍的保守勢力之抵制，皆將使蘇聯在邁向政治民主化與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面臨更多的挑戰與挫折。至於中共，不僅政治改革理念最爲保守，且封建、教條思想嚴重，保守勢力雄厚，皆將使政治民主與市場經濟無由實現。因此，大陸人民要能享受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果實還有一段漫長而艱辛的路要走。

從中共本質的堅持與策略的運用，以及短期與長期的觀點分析，中共在改革十年中對於黨的專政、公有制結構與計劃經濟的堅持並無

本質上的變化，但其經濟體制的調整與措施的更張卻顯現出高度彈性與策略性。因此就短期而言，中共經濟改革仍將持續，但將不致於實行資本主義，也不會採行經濟改革前的經濟體制。換言之，中共將在保持社會主義經濟基本特色下推動富資本主義色彩的改革。而政治改革基本上亦將停留在行政層次的改革，中共雖不會採行民主政治，但亦不致厲行高度的政治專政，而將容忍有限度的政治自由化。而就長期觀點而論，只要共黨仍強調並維繫專政利益的心態與作爲不變，上述政治與經濟改革的取向將不致有大幅的變更。此外，必須指出的是：共黨本質的突破將是大陸政經發展與變革的關鍵要素。因此，一旦此一假設成爲事實，中國大陸實行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可能性將大增。

就中共政經改革趨勢而論，其政治改革將不涉及政治制度的變革，中共仍將實行一黨專政，排拒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但將強化行政體系的功能。在經濟上，中共將在公有制與計劃經濟爲主體的前提下持續深化改革，並將持續引用資本主義的方法與措施，而其幅度大小則須視派系勢力消長與領導階層的認知而定。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經濟的深化改革必須有相應的政治民主化，始能發揮真正的功能；資本主義方法和措施的引用必須植基於私有制爲主的體制上，才會產生真正正的效果。東歐共產國家政經改革的經驗明確顯示：局部的、淺層的改革絕不會給共產國家帶來突破性的發展

。因此必須進行全面的、深層的與徹底的改革，亦即以最後建立私有制為主的經濟制度，以及多黨制的政治制度為目標的改革。【註32】明顯地，中共囿於意識形態和維護共黨專政利益的政經體制變革，必然是局限性的改革，此勢必增加改革的風險性，並呈現不穩定的特質。

註釋

- 【註1】：蕭全政，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初版（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二五一—二六頁。
- 【註2】：玄默，「中共一黨專政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匪情研究，第三二卷第一期（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廿五日），第九八頁。
- 【註3】：Alexander Eckste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1 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6), pp. 65-66. 另參見·帕深思·莫頓等著，黃瑞祺編譯，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一版（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三年三月），第一二四—一四八頁。
- 【註4】：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Y. Basic Books, Inc., 1969), p. 22.
- 【註5】：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Sociology, 沙亦羣譯，意識形態與社會變遷，一版（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二年二月），第一二〇頁。
- 【註6】：金耀基，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初版（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四年十月廿日），第十四頁。
- 【註7】：A. Giddens,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London: Hutchinson Co., 1973), p. 294.
- 【註8】：Karl R.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2), p. 120.
- 【註9】：曼德爾，黃惟文編譯，從斯大林主義到歐共主義，初版（台北：南方叢書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一月），第八十七頁。
- 【註10】：金耀基，「社會主義之定位與定性」，中國人的三個政治，一版（台北：經濟與生活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一月廿日），第二一八頁。
- 【註11】：Ludwig von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pp. 240-241.
- 【註12】：宋國誠，「中國式社會主義的意識危機」，中國論壇（半月刊），第二三期（台北：中國論壇社，民國七十四年五月十日），第三〇頁。
- 【註13】：范澎濤，「選擇經濟制度的原則」，經濟制度論叢，初版（香港：友聯出版社，一九五七年九月），第十一—十二頁。
- 【註14】：吉拉斯，新階級，再版（台北：龍田出版社，民國六十八年五月），第一一五頁。
- 【註15】：雖然中共「改革派」強調市場調節機能的運作，但並未放棄計劃經濟的主張。而「保守派」的經濟路線顯較強化計劃經濟的重要性。總體而言，兩派對計劃經濟的觀點容或有採用程度上的差異，但卻無本質上的分別。
- 【註16】：Ricky Tung,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Wake of the CCP's Thir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Issues & Studies, Vol. 23, No. 12 (Dec. 1987), pp. 61-62.

- 【註17】：張少威，「大中企業有三難題」，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四月廿八日，第二版。此外，一九八八年大陸缺乏效率營運虧損的企業，較一九八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六點六。其中由中央控制的公司虧損特別嚴重。參見：「中共虧損企業去年又大幅增加」，中共經貿動態摘報，第二六七期（台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一日），第一頁。
- 【註18】：蘇紹智、王逸舟，「改革的兩大歷史任務」，新華文摘，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五日）第一頁。
- 【註19】：傅利曼，「為社會發展利用市場」，信報財經月刊，總一三九期（香港：信報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第二〇頁。
- 【註20】：王碧峰，「關於我國經濟周期性波動的討論綜述」，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雙月刊），總第四三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廿八日），第七七頁。
- 【註21】：方勵之，「中國的失望和希望」，聯合報，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一日，特刊第二版。
- 【註22】：「Peking Duck,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Feb. 28, 1989), p. 10. 杜飛進、徐蔡燦，「商品經濟和民主化」，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一日，第二版。
- 【註23】：高希均，「資源有限，要求無窮」，天下雜誌，第七二期（台北：天下雜誌社，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第七頁。
- 【註24】：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鄧小平於「全國科學大會」上始承認科學與技術是生產力。參見：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知識分子問題文獻選編，一版（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二四—三二頁。
- 【註25】：金觀濤，「站在時代的高度理解中華民族精神文明建設的意義」，走向未來，第二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第七頁。
- 【註26】：江炳倫，政治發展理論，五版（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七十四年三月），第三六一—三七頁。
- 【註27】：John Bryan Starr, "Redefining Chinese Socialism," Current History, Vol. 83, No. 494 (Sept. 1984), p. 268.
- 【註28】：改革開放搞活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版（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一日），第一—十六頁。
- 【註29】：玄默，「鄧小平關於『反自由化』的奇談怪論」，匪情研究，第三〇卷第五期（台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民國七十六年五月廿五日），第二五頁。金耀基，「中國的將來與現代化」，信報財經月刊，總一四一期（香港：信報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第三五頁。
- 【註30】：嚴家其，「改革的巨輪在大洋中航」，經濟導報（周刊），總一一四期（香港：經濟導報社，一九八九年四月十日），第九頁。魯凡之，「當代中國的西化與民主問題」，南方月刊，第十七期，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第三版。Werner Pfennig, "On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RC During the 1980's," The Fifth Sino-European Conference (Sept. 1-5, 1988), p. 10.
- 【註31】：索拉茲，「斯大林主義向何處去」，世界經濟導報，一九八九年三月六日，第十四版。
- 【註32】：溫輝，東歐探索，初版（香港：百家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十三—十五頁。